



整治行动



城管笔记

◎王定方

整治行动开始前半小时,张队长神秘地通知我说:今晚要整治夜宵摊。

那一带的夜宵摊已经存在好多年了,附近居民受到烧烤摊的油烟、气味、垃圾,以及烧烤摊顾客酒后的喧哗、叫骂、吵架、发酒疯等影响,苦不堪言,频频投诉。中队也颇感压力。

我在夜间中队上班,晚上有任务,早已习以为常,自然是处之泰然、安之若素的,但整治行动例外——每次遇上,总难免感到紧张兮兮的。

五年前的深秋时节,我进入城管队伍不久,在街道中队上正常班。某拆迁安置小区门口,一个新的马路菜场有渐成锥形的趋势。起先只是小区里面的个别农民在马路边放一些吃不完的青菜、辣椒、鸡蛋、茄子什么的,自产自销,小打小闹,也还能服从管理;后来,外来的摊贩,骑着电瓶车,搭着几蛇皮袋的蔬菜,搭着两三层拥挤不堪的鸡、搭着三四筐带鱼乌贼小鲳鱼,从远处赶来了;再后来,一货车大白菜、一货车茼蒿、一货车胖头鱼,从更远的地方来了……

管理难度越来越大,举报电话越来越多,居民反应越来越强烈。队里决定整治。头天下班前,队里要求所有队员次日早上4点在办公室集合,不准泄密、不准请假、不准迟到。几个离家远,平时靠公交车上班的队员只好在各自的储物柜里翻出了冬装,裹着,或坐或躺,在中队凑合了一夜。

那晚,我8点不到就上床睡了,计算着睡到凌晨2点半也能睡上六七个小时,不至于睡眠太过不足。只是没想到,整个晚上我一直不由自主地揣测整治过程,想象各种情景,想象各种意外,想象各种应付办法,又因为与平时睡眠习惯相差太大,竟然一直辗转反侧睡不着。

直到1点多才睡意渐浓,但我却不断警告自己不能睡得太熟,以免睡过了头;又不时勉强自己睁开眼睛,拿手机看时间。如此往复,直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。离设定的闹钟响起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了,我便轻手轻脚地摸黑起来,可妻子还是问了我一句:“你起来了啊?”

3点左右开车出门,路上高压钠灯的灯光刺得疲惫的眼睛有些难受,我便拉下了遮阳板。眼睛好受多了。遮阳板遮住了高处的所有光线,也包括红绿灯。直到开过了十字路口,我才愕然发现自己闯过了红灯,但木已成舟,悔之已晚。罚款扣分。幸好夜深天冷人少,没有什么意外发生。

4点钟,队员到齐了。整装出发的时候,一轮孤寂的明月正出神地望着我们。

我们到达“马路菜场”的时候,天还没亮。早起的摊贩已经摆好了摊位,吆喝开了;有些摊贩正三三两两地把商品摆放出来;还有些摊贩刚停下车,货物还没搬出来;也有一些位置空着,显然主人还没有到达。一见浩浩荡荡的车队,手脚麻利的、眼观四方耳听八方的、离得远的摊贩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商品收了起来,又飞快地驱车离开;也有些货物还在电瓶车、三轮车上的摊贩,立马掉转车头,走了;还有一些摊贩尚在路口,看了一眼,也走了。但总有几摊来不及收的。

一台电子秤、一辆三轮车、几筐瓜果、几筐蔬菜,没来得及收的总归被扣了一些。我的任务是按照所查扣的货物,填写

单子,并将单子留给当事人,以便其到相关部门去接受处理。

一个妇人一直跟着查扣了她半筐蔬菜的同事,先是苦苦哀求,后又撕心裂肺地叫喊,再后来她似乎绝望了,便肆无忌惮地叫骂起来。我正手忙脚乱地填写单子,想着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,没空理会这些。突然,她竟然毫无征兆地瘫倒了,躺在了丢满枯叶烂叶的水泥地面上,背部着地,仰面朝天。她不再哭泣,只是快速大口喘气,似乎下一口气就要接不上来了,脑袋不由自主地快速左右摇摆,手脚微微抬起,不断抽搐。

这个时节的凌晨还是很冷的,地面更冷。躺在地上的妇人四五十岁了,头发干枯,如干草一般,脸庞红得发黑,是长期经受风吹雨打的印痕,暗红色的劣质棉衣与粗糙厚实的深色裤子,在黎明前的夜色中,显得更加低沉、朴素。我于心不忍,又紧张不已,又不知所措,又心烦意乱,僵立在那儿。“快!快送医院!”好在老队员有经验。

到了医院一检查,医生说:没事,很健康!

我暗暗长舒了一口气。不管她是不是装的,人没事就好!

整治过程是容易爆发冲突的过程,尽管我们此前已经对摊贩无数次地解释过、宣传过、劝离过、要求过、责令过;尽管摊贩也无数次地答应过、保证过、决心过,或者无数次地无视过、谩骂过、对抗过。但围观的群众可不管这些,总有些人对城管的整治指指点点,说三道四。有一年夏天,奔波忙碌了一晚,直到凌晨两三点才有空稍息片刻,凌晨5点,又开始协助街道中队整治。7点多,整治快结束的时候,我双腿已发软,人也变得轻飘飘的了,走在路上像踩着棉花一样,行动机械,疲惫不堪。正在锻炼的大爷大妈围了过来。不少大妈帮着摊贩说好话,说:“算了算了,他们下次不放了。”“你们别扣了,他们也不容易。”这自然是好心好意的,不忍心看着摊贩失落无助的样子。但也有个别人竟然破口大骂起来……

言语威胁、咒骂怒斥都是细枝末节,但油、炭、热水瓶、桌、椅、铁夹、菜刀等等“武器”的进攻却不可等闲视之。我碰到过一个真正拿利刀出来的摊贩——不是远远地拿刀比画一下,恐吓一下,装装样子。

他是卖肉的,一把闪着凉气的匕首掏了出来,一路冲到了一位副队长跟前。那位副队长岿然不动,据理力争。他那匕首就贴在副队长脖子皮肤上,比画来、比画去……

警察赶到前,他翻墙逃跑了,但半小时后即被抓获。好在没有酿成严重后果。

因为上述种种原因,我不喜欢整治行动。但这只是我内心深处的私密想法。这次要整治夜宵摊,我一如往昔地认真真地检查了文件、单子、签字笔、证件、取证设备等,叠好、整平,放进了公文包。

车子大大小小的有七辆,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我的心中默默祈祷,但愿一切顺利。

车队赶到夜宵摊平时摆摊的地方,却见马路边树影婆娑,空气清新,道路通畅,行人匆匆,一切井然有序。只有地上经年累月积下的油污告诉我们:这里曾是夜宵摊的“地盘”。

今夜宁静如水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人们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一眼我们这支比较庞大的车队,又各自忙开了。

喜糖

◎陈红莲

午休的时候,办公室里来了分厂的李师傅。他剃光头,体胖肚大胳膊粗,眼如铜铃,肤染金棕,眼神如四大金刚一样威严,笑容却弥勒佛一样和善,肩上扛着一个大大的纸箱,蹬蹬蹬几步走上楼来,迎面碰上正要出去的老板娘。

老板娘好奇地问:“李师傅,你这是干啥呀?”

李师傅声若洪钟般回答:“分喜糖,我儿子下个月要结婚了!你座位在哪儿?”

老板娘说:“在里面呢,你放着吧,恭喜恭喜。”

这时办公室只有小赵和我在,李师傅笑呵呵走进来,拿出用礼盒包装好的喜糖,递给我们。接过一看,里面有两包喜糖,小赵就笑嘻嘻地说:“你儿子结婚啦?给我们吃几颗糖欢喜一下好了,送这么多,真客气。谢谢啊!”

李师傅一一问小赵,“老马坐哪儿,小刘哪儿?老会计哪儿……”末了,又问:“外贸部过来的小周坐哪儿?”

小赵一一指点,李师傅把一盒盒喜糖分放在他们的座位上,有红彤彤的礼盒点缀,办公室变得喜庆了。

一会儿大伙陆续回来了,看到桌子上的喜糖,问:“谁的喜糖?”

得知是李师傅儿子的喜糖,又每人分两包,众人都表示李师傅真大方,已经有人拆开来放进嘴里嚼,一边赞赏喜糖味道不错。

不知是谁说了一句:“婚前送两包糖,那我们要不要送礼啊?”这句话声音不轻不重,却像一颗炸弹,引爆了整个办公室,大家议论纷纷。

有的说:“啊,要送礼啊?又不熟。”

有的说:“不会吧,李师傅本意不是让我们送礼吧?他人豪爽,又逢喜事,一高兴,送得多了点。”

还有人说:“按照我们宁波人的习俗,结婚前送两包喜糖,是要包红包的。”

大家一想,觉得有理。

这时,外贸部的小周说话了:“那个李师傅,我跟他几乎没交集,他大概是送错了吧,可能是送给小金的,小金没收到糖哎。”

小赵说:“他是送给你的呀,他问了外贸部的小周坐哪儿呀,再说了小金的老公在分厂,李师傅肯定分在她老公那边了。”于是众人讨论该怎样包红包,包多少。

老马说:“要不每人送500元,包在一起,一共十一人,有5500元,再加100元,凑个吉利数?”

小周小声咕哝,多了,又不熟。

说起李师傅,的确不太熟。他是外地人,在分分管车间有些年头了,这边是总部,一年难得几回见,不过每年的年会上,总是能碰到的。他长得威武健壮,性格又爽直痛快,喝起酒来一杯接一杯,总会过来热情地跟我们碰杯,像老朋友一样聊天。至于他的儿子,因人在外地,并没有见过。

这时老会计也回来了,他一看桌子上的喜糖,一声不响,当作没这回事。小赵只好说:“会计,喜糖是分厂的李师傅分的,他儿子下个月要结婚呢。”

老会计面面无表情地说:“哪个李师傅?人也不认得,给我吃糖,太客气了吧?我年纪大了,不能吃糖了,现在的糖又不好吃,免了吧。”一边说一边拎起喜糖,放到对面老板娘的位置上。

众人面面相觑,心里感叹姜是老的辣,好像早已料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吃喜糖肯定要送礼金。

大家只好把送礼的人数减为十人,又为礼金的数目商量起来。

小赵说:“不如让小刘来决定吧,小刘跟李师傅是老乡,平常走动多,我们顺着他来吧。”

大伙转头去看小刘。

小刘笑着说:“我是这么想的,要不每人送200元,十个人2000元,请上李师傅,到附近的小饭馆聚一下,一来经济实惠,二来路近不用开车可以喝酒,大伙就当聚聚餐图个热闹,也不伤元气,如何?就不知连酒带烟什么的2000元够了么?李师傅一片好意,也不能让他亏本。”

老马说:“小刘,麻烦你去李师傅那打听一下,看他选择哪个饭店,如果他选小饭店,按你说的办,如果是大饭店,相应增加礼金,保证不让李师傅亏损,大家看怎么样?”

众人点头称是,均接受这个建议。

这时老板娘回来了,看到自己桌子上喜糖多了,再看会计的桌子空空的,以为李师傅放错了地方,就把喜糖重新放了过去。

那个时候,老会计上洗手间了。